

高等教育事业严重地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已是大家知道的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举两个数字看一看。一个是在我们全职工人数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到百分之四。广大农村的劳动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更凤毛麟角。再一个是中学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升学率也在百分之四以下。许许多多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苦于求学无门。改变这种状况，似已燃眉之急。十年树人。如果现在不去着手改变，不积极设法逐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人数，那么，不仅到一九八五年专门人才奇缺的情形不会得到多少缓和，甚至到一九九〇年还会感到专门人才严重不足。

怎样才能较快地改变这种严重局面呢？很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要国家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来扩建和兴办高等学校。确实，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多年毁学，加上我们在计划安排上对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应有的支持，造成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事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最近二、三年来，党和国家在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限于国力，这种比例失调的状况，只能逐步加以调整。党和国家已经确定，今后要逐步提高教育事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的比重。只要坚决贯彻这个方针，可以预料，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壮大，情况将会越来越好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教育事业内部还有没有潜力呢？能不能做到少花钱多兴点学呢？我们想是有的。当前来说，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多想点办法，广开学校。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按照一种模式在办的：全日制；全住校；统招统配；学制也比较长，大多数是四年和五年制。虽然其间也办过函授学校、电视大学等，但规模不大，又及时办辍。这二、三年，电视大学有了新的气象，一些学校开始举办了分校，有的实行走读制和实行学分制，这些改革的尝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如果能够大力支持这些改革措施，积极扶植它们发展，切实帮助它们解决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并且广泛地探索、试验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那么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即使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加快发展的。

就以走读来说，如果全国所有高等学校普遍对所在城市的学生实行走读制，那么每年就可能多招几万名学生入学。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这样比较艰苦的居住条件，学校每增加一名住读学生，大约至少要增加一千元左右的基本建设投资。无论是在国外，无论是

广开办学路

——谈谈高等教育事业中的一个问题

吴明瑜 鲍 彤

编者按：本报今天发表吴明瑜、鲍彤同志的文章，是希望大家就整个教育工作展开讨论。粉碎“四人帮”以来，教育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很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大发展，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把教育办好，把路子走宽。因此，很有必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我们欢迎教育战线和其他战线的同志，参加这个讨论，发表各种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的意见。

在旧中国，全住校的仅仅是少数条件充裕的学校才能做到。有的同志担心实行走读会给城市交通增加负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建造校舍，或是添置交通车辆开辟专线，究竟哪个省钱而又见效快，岂不是一比较就清楚了吗？当然，扩大招收走读生，必定会带来许多新问题，例如需要扩大图书馆阅览室，方便学生自习，以及很好地解决学生的午餐和饮水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应当抱积极态度去解决，不应当因此而反对实行走读裹足不前。

再如，可以更多地举办分校，还可以举办夜校、补习学校，或者举办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专科学校，以及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二年制专科学校，等等。形式、学制可以多种多样，从实际出发，不必强求统一。校舍从哪里来？我们至少有几个途径：一是充分利用各高等学校的现有教室。现在不少高等学校的教室利用率相当低，大有潜力可挖。二是尽量利用各中学的校舍。现在中等学校的教室一般都只是白天上课，完全可以利用起来举办夜校，当然一定要很好地改善照明条件。三是随着工业战线的调整整顿，将会有一些工厂关停并转。腾出来的房子干什么？总要办点有益的事业。其中之一，就可以考虑利用一部分厂房改办学校。现在一提广开学校，似乎校舍问题成了一拦路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这样广开学校，师资有没有困难？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里，还不至于有特别大的困难。国外许多高等学校师生人数的比例是一比十，我们许多学校则是一比几，甚至只有一比二、一比三。这种现象太不正常了。应该说，不是教师少得不成比例，而是学生少得不成比例，可见潜力是很大很大的。我们还应当鼓励和提高有条件的教师更多地兼课。现在有一些人不适当地限制兼课的规定，很需要加以修改。近代学校制度的兴起，重要原因是由于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培养专门人才。象《红楼梦》里的那种私塾制度，一个老师还能教十来个学生。近代学校实行班级制度后，一个老师可以向前一个以至几个班级讲课，效率提

高了。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电视、录像、录音等技术的发展，电化教育有了新的飞跃。利用现代化的电化教育工具，一个老师讲课，可以同时有几百几千甚至几十万人收听收看，效率就更是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开展电化教育，不仅要花力气认真办好全国的电视大学，还可以在城里市、学校里利用电视、录像等技术工具，进行教学。这不仅可以克服某些地方师资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可以把那些优秀教师

的讲课内容，更广泛地传授给学生，因而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措施。这样广开学校，仪器设备，教学工具，学生的实验设备如何解决？这方面的确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国家财力物力上要给以必要的支持。还应当大大提高高等学校现有实验室的利用率。各个教学仪器工厂，以及许多高等学校的附属工厂，也应当积极承担任务，更多地试制和生产各种教学设备。同时，从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情况来看，除了要积极发展理工农医这些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业院校和系科外，还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专业院校和系科。多年来，我们对这些方面严重忽视了。特别是经济、企业管理、统计、法律、国际政治、历史、语言等领域，几乎没有培养出多少专门人才。而且退一步说，即使由于物质条件限制，暂时只能多招收一些文科学生，这对于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也是很有益的。不要因为理工科的教学设备一时难以解决，就干脆把扩大招收文、法、管等各科学生的门路也堵死了。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广开学校，会不会降低高等学校的质量？所以，有些地方，刚试办走读，就被取消了。有些学校办的分校，也难以为了继了。质量问题，我们认为不能一律要求。全国各地，条件相差很大，不能一律要求。一个城市的各个学校，也不能一律要求。即使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当然，这不是说不必对各类不同的学校各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比如，全国重点大学，应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也实行走读，并未影响学生质量和学校声誉。去年，上海市各学校共有一万多名学生走读，实践证明，学生学习的成绩是好的。还有分校，天津市、北京市试办以来，成效也是显著的。旧中国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学不拘一格，形式多种多样，条件非常艰苦，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使当时许多条件比他优越的学校无法望其项背。可见办学形式问题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问题，在是否认真办学，是否领导得法。认为走读生的水平一定比住校生低，分校学生的水平一定比本校学生低，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我们国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相差悬殊，发展教育事业如同发展其他事业一样，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不要一办事就全国一刀切，一样的要求，一样的做法。在办学条件好，花钱不多而收效可能较好的地方，就应当多办；在目前办学条件差，事情比较多的地方，就不要同样要求。同时，还要大力倡导和鼓励人们自学。学校固然可以培养人才，自学同样可以造就人才。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策，比如对于自学的学生，应当规定考核的办法。如经过考核，确实达到大学毕业生同等学历水平，就应当发给证书，并按大学毕业生一样学

当然，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广开学校，是一个新事情，而且是牵动许多方面的大事情。比如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高等学校的助学金制度，是否需作相应的改革？教育结构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高等学校的一整套管理制度、教学制度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等等，许多问题都提到我们面前来的。我们也不是说，可以不顾具体条件，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力支持和开展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认为，提出新的问题，努力去解决新的问题，这是我们教育事业共同努力兴旺发达之所在。我们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空前繁荣的前景。

于光远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讨论回答科学工作者建议应该成为一种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三十一日电 于光远认为：“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团体向党和政府提出自己对建设工作的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地讨论、回答这些建议，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种制度，而且是长期执行的制度。”他说，实行这样的制度，“那我们这样的建设工作就会大大减少盲目性，避免瞎指挥，从而少走弯路，少受损失。”于光远的这些意见是在他写的《关于科学工作者建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今天的《光明日报》上。

于光远说，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的设计、设计方案要采取“论文答辩”的方式，谁就把全部材料写出来，发给有关单位看，然后举行“论文答辩”，允许别人提意见，如果要把别人的意见都驳倒了，那么这个计划、方案就成立了。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这个计划、方案出了毛病，造成了损失，不但提出这个计划、方案的人和单位要负责任，参加“论文答辩”的人和单位，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因此也就没有敷衍他。

他说，一项有科学根据的建议，既然对国家有很大好处，那也应该同其他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一样得到奖励，这也应该制订出具体条例或章程来，以便遵守。他认为，科学工作者的建议是否合理，仅仅从需要和主观愿望来看是不行的，必须从自然科学和技术经济这两个角度来考察。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要研究的是：建议在科学上是否合理。至于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就要求：一些建议如果只是从技术上看是可行的，但从经济上、社会条件上看是不可行的，或者没有经过过细的调查以前，觉得是可行的，而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就不应该贸然去做，而需要进一步做科学研究。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建议时，要尽可能做到家，要研究建议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研究工作越仔细、越完整就越好，建议本身就越有说服力。

文章建议，为了使将提出的建议有充分的根据，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密切合作。

文章建议，为了使将提出的建议有充分的根据，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密切合作。

我国三种计量仪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新华社北京五月三十一日电 我国的第一台可移式激光绝对重力仪和两种高精度激光器——稳频激光器与甲烷稳定激光器，在最近的一次国际比对中达到世界同类仪器先进水平。

可移式激光绝对重力仪和甲烷稳定激光器是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稳频激光器是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协作研制的。今年四月，有关人员带着这几种仪器前往法国巴黎国际计量局比试。比试结果表明：由真空系统、精密机械传动系统、干涉仪及多种电子设备组成的绝对重力仪精密度高，准确度与已在巴黎比试过的英、苏、意三国的同类仪器具有同等国际先进水平。两台激光器性能良好，数据稳定可靠；与国际计量局的差距，同已在那里比试过的法、英、西德、苏、美五国的同类装置比，也同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次国际比试，反映了我国研制现代化计量仪器的新水平。在国际计量局工作的日本专家佐久间博士仔细鉴定了重力仪比试时的全部实验数据，高兴地称赞中国研制的这台重力仪“测量的数据质量很好”。国际计量局负责激光比试的外国专家萨哈蒂先生，对中国两台激光器的比试结果，满意地说：“中国人研制的激光器同样达到了国际水平”，还称赞它们不仅性能好，而且结构紧凑，美观坚固。



北京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果树林业研究所所长周崧（左），长期身居深山区，从事蜜蜂的遗传育种研究，为我国养蜂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记者 郑书福摄

杂谈

为有源头活水来

柯蔚

平时，说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某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似乎都很明白，都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个人、集体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大道理来。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触及到他所在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某单位积压了一些学非所用的科研人员，别的单位急需，本人也要求调出，有的甚至上级主管部门还下了调令，可就是卡住不发放。理由是：今天用不着，还可以储备起来留待将来用。

某科研单位进口了一套先进技术，别的兄弟单位要求借用做些实验。答复是：不行，那会影响“我们”工作，最好你们自己申请再进口一套。

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作为一个单位的当家人来说，真可谓有心眼、有算计。可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来说，却使人实在不敢恭维。相反，倒应当受到批评。

第一、他们似乎忘记了，在我们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切物质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也是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的。人才，也是国家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国家所属的每个单位的人员、器材、物资、设备、房屋等，都是国家分配、调拨的，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权重新调整、分配。每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只是受国家和人民的委托去领导和管理工作，如果要把本单位的干部、物资等，都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象一架庞大的机器，各个单位只是这部机器上的零部件。每个单位的领导人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时候，都应当有全局观念，既要照顾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又要照顾到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集体、个人的局部利益和国家全局利益发生矛盾，就应当自觉地服从全局利益。决不能只顾本单位或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三、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无数个体和集体的总和，国家利益就代表和包括了个人、集体的利益，个人、集体和国家是休戚相关、荣枯与共的。不能把国家利益和个人、集体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对国家有利时，个人和集体不一定受益。诚然，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国家繁荣富强了，集体和个人利益才有保障，集体、个人才有光明的前途。正象古人所说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四个现代化是国家、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个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为四化服务，为四化贡献力量，千方百计支援四化的需要，决不能借口个人、集体利益而影响四化建设。但眼前因私废公、因小集体而忘记国家利益的同志，尽快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正确处理公与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则四化幸甚，国家幸甚！

划生育领导机构帮助解决。

建议成立遗传咨询门诊

贵州省遗传学会理事长 刘振业

我国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上也要加以控制，而且要有战略性的任务。我国人口数量大，质量上也要加以控制，而且要有战略性的任务。我国人口数量大，质量上也要加以控制，而且要有战略性的任务。

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

李洪林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我这里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三中全会的方针。如果说思想解放过了头，那就是说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不但早已贯彻到底，而且走得太远，现在该回头了。

这种批评是全局性的，不单是针对哪条战线，不过思想战线首当其冲，所以我对思想界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当前思想界没有没有混乱现象？当然有。不过已经好多了。建国以来，思想最混乱的时期就是林彪、“四人帮”横行那十年。许多重要的是非颠倒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叫作“修正主义”，而极左思潮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最大的思想混乱么？但是，对于这种是非颠倒，谁也不许说；说了就是反革命。所以那时的思想混乱，又表现为鸦雀无声。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打破了极左思潮的精神枷锁，使大家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颠倒了的非非加以澄清，这才从根本上扭转了那种最严重的思想混乱。在这场

解放思想的战斗中，真理标准的讨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践标准的检验下，现代迷信破产了。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也就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正本清源，是思想战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换句话说，解放思想，恰恰是克服“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的手段，是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大家思想的手段，怎么能引起思想混乱呢？

由于解放思想，由于党中央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于群众信任我们党，大家都敢讲出心里的话，并且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在一定范围内对一些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或者积极地向领导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我国思想界，确实出现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主流应当说是好得很，决不是什么混乱。

当然，支流总是有的。有人难免会犯错误，这也不必大惊小怪，改了就是。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免不了犯错误，一般的同志说错了话就不得了了吗？

现在批判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并且必然要侵蚀我们的肌体。我们不能不忽视这个方面，小生产者的思想也在束缚着人们的眼

应当记住历史的教训：过去正是从思想战线开始，越斗越扩大，结果满天下大乱。当前思想界某种程度的混乱，正是在新旧交替之际，旧的还没有完全克服的结果。从这方面看，思想解放还差得多，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头”的问题。至于有人胡思乱想，并且自以为是在“解放思想”，那是他们不了解思想解放的含义，或是利用思想解放的旗号去干他自己要干的事情。三中全会的方针不能为这类胡思乱想负责。因为任何旗号都有可能被人利用，正如有些名牌产品的牌子被冒牌货所利用一样。被利用的旗号是不能对这种现象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不断地被人利用，难道也能说马克思主义宣传得过了头吗？

在四化的道路上，不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去认识和解决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正确的方针只有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干扰是有的，“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有干扰就要排除，有什么干扰就排除什么干扰，决不犹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要影响我们实现四化的总目标，也不能动摇我们贯彻三中全会方针的决心。

义、大主观主义，成效才会显著。应当看到，在经济上，我们同样经受不起大“折腾”，更要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更多地听听专家和群众的意见，要坚决认真地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长官意志”。

同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也不能再搞大“折腾”了，因为这会引起知识分子的恐惧，会大大干扰四化的进程。对在这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切实接受多年来惨痛教训，要仔细分析，区别对待，谨慎从事，千万鲁莽急躁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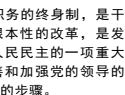
总之，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贯彻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去。这三个方面都要象孔子说的那样，“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套用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的一段话，就是：老一套的失败了的做法必须废止，自我赞美的错误调子必须少唱，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必须休戚，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工作作风！

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不能再“折腾”了

曾彦修

近两年来，党中央坚持实践标准，逐步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唯物主义的路线。当然，这里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不过，这两者我喜欢反复说是唯物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等鲜明的对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就难免要变成主观主义，变成唯意志论，发展到后来，就是林彪的“精神原子弹”（廖虚蒲插话：有人说精神有时可以决定物质，这是不对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决定精神，是无条件的，这是唯物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怎么会花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呢？我们形成现在这样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怎



★ 报刊论文 ★
★ 摘要 ★

有的同志也许会问，我们国家有过干部终身任职的制度吗？现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含义是什么？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政策？

在我国，干部终身任职虽然没有什么正式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着的。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干部队伍的状况，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个人经进入干部队伍的行列，就只能终身为“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干部才会被解除职务：一种是逝世了，一种是犯了错误（或者被认为是犯了错误）。在一般情况下，干部降职免职这种正常的程序，却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干部职务终身制是确实存在的。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就是说，在干部任职的时候，他们的职务可升可降；当他们丧失工作能力或者应当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职务可以解除。这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项根本改革，各级领导干部都包括在内。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关键在于废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因为干部担任的职务愈高，他们所负的责任就愈重。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在现阶段来说，关系到能否顺利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就能够保证处于这个岗位上的干部，始终是称职的，胜任的。

干部职务终身制在我国的出现和存在，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终身制”是封建主义残余在我们干部制度中的一种反映。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所谓“真龙天子”，一朝即位称帝，除非是农民起义把他推翻，或者是宫廷将领篡他取代，否则，不到“驾崩”是不会退位的（“禅让”之事只是一种古代传说）。各级官员是皇帝的臣属，只能由朝廷任命委派，平民百姓根本无权过问。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涤荡和清除。我们的干部同封建朝代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有些干部却自觉不自觉地用旧观念、旧眼光来看待干部职务以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差别。

我们是在推翻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的。尽管我们努力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政权，推行人民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制的确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的权利，但是一部分干

部制度和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是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积极而切实的步骤。

只有长期地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这两年来，从党中央到老百姓，都无数次地强调或呼吁，我们国家再经不起反复的“大折腾”了。我认为，用“折腾”二字来形容我们这些年反面的、扩大化的、人为的、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很恰当的。举个

例子来说，把一碗水用两个碗激烈地反复折腾过，折过去，不要一分钟，就可以把这碗水折腾得接近精光了。党中央这个不要再大折腾的决定，本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在内，但是两年来习惯上的了解，多指的阶级斗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也要很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路线和行动路线。我们中国太穷了，不能动辄搞几个亿、几十个亿地丢在荒山沟里，淹到地底下，浮在沙滩上，而不能起应该起的作用，弄得上下不能上，下不能下，老百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党领导，经济立法，要更多地从大处着眼，不要只管几个小厂长、小党委书记、主要的要管住大分散主义、大无政府主义。

干部队伍来说，建国以前，我们的许多干部是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特别是身经百战的老干部，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革命终身，就应当是任职终身，特别是对领袖人物，更是“理所当然”了。同时，不少老干部在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由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正年富力，可以担负比较长时间的领导职务。因而，又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干部就是应当而且可以终身任职。其实，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终身，而不是终身任职。

终身制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使得人们越来越痛感到它的弊端。他们出于篡夺政权的需要，一方来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一方面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的“终身制”。他们这样做，目的就是要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的世袭王朝。林彪、“四人帮”的美梦虽然破产了，他们散布的封建主义毒素时至今日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有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干部队伍也是这样。党和国家的干部就有个能上能下、有进有退的问题。我们的老同志都有许多宝贵的工作，多干些时间，但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任何人都有一些年老体衰问题，即使是伟大人物、杰出人物也不例外。到了晚年，人的精力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接触群众，都会受到许多限制，在第一线领导和指挥革命和建设，就会发生一些困难。因此，只有大批青年干部在政治思想上日益成熟，工作才干日益增强，不断补充到各级领导队伍上来，才能使我们的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持续发展下去。终身制违背新陈代谢这个自然规律，不利于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

终身制事实上给了某些干部一个“铁饭碗”。干好干坏，能干不能干，都能终身为“官”，并且只会上不

会下。这就容易使一些干部丧失事业心和进取心，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往往给个别投机钻营分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这些人一旦混入干部队伍，窃取了某种职务以后，不到其面目彻底暴露，是不会被下台的。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么多年，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废止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会不会否定、削弱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呢？不会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袖人物的作用，是错误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他们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实施正确的领导，尽量减少错误，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带领人民群众胜利前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要求领袖人物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经常处于全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并不表现在他们是否终身担任领袖职务，而是表现在他们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实际贡献上。人民群众是从这一点上仅仅是从这一点来评价和肯定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不是意味着排斥老干部，不让他们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呢？当然不是。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人物，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清史简编》（上编）出版，是我国第一部《清史简编》（上编）出版，最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史简编》（上编）分上下四编。上编从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建立清朝，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夕，约三十四万字。下编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约三十四万字。中编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三十四万字。后编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约三十四万字。《清史简编》（上编）出版，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也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史简编》（上编）出版，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也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史简编》（上编）出版，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也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史简编》（上编）出版，不仅在我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而且也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

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确立起来了。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造我们的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工作也来一个社会化，以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情和认识世界。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早已取得了胜利，现在又担负起领导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在我国革命问题上，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和血腥镇压，我们认识了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在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一开始党内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当时的国情，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中国城乡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解放了全中国。

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上，也要求全党重新认识国情和重新认识世界，逐步地探索出一条取得胜利的

建设中国需要了解国情，进行中国革命所需要了解的东西，广泛得多，复杂得多，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科学、政治的不断进步，国情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我们时时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搞四个现代化，要向地球开战。那么在我们的国土上，无论是地下、地上、天空的自然资源，到底哪些东西多，哪些东西少，哪些宝贵，哪些不利，等等，总需要大致搞清楚吧！比如说，我们的矿产资源，据统计，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的就九种，占第二位的有五种。这该说是资源大国吧，但可惜不少储量还没有完全探明，分布也不平衡，它也有一个大特点，就是建设方矿多，宜于综合利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冶金工业的建设工程应该怎样呢？

又如水利，我们对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流，了解得怎样呢？有人认为，长江中下游应该成为航运、造林、养鱼及观光旅游的主要水道，而不应搞那些破坏生态平衡的工程。黄河的祸害如能制服，中国一部饥荒、灾难、贫穷的农业史即可结束。珠江应作多目标的经济利用，这些看法对不对呢？

搞四个现代化，更必须根据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制定我们一系列的政、措施。靠劳动力来谈，现在我们重工业、轻工业的劳动力在工业劳动力中分别约为百分之六十与百分之四十。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在整个劳动力结构中只占百分之十（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八，苏联为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劳动力结构到底合理不合理？是否需要调整？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必须认真研究。

我们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要从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下，急起直追那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不但要重新认识国情，而且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在教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问题等等，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取长补短，少走弯路。长期以来，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对当代世界各方面情况的认识是相当贫乏的，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在指导工作中曾经发生不少失误。

要搞现代化，重新认识国情和重新认识世界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调查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既要了解国内，又要了解世界，因此仅仅满足于那些手工业方式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不够的，仅仅依靠个别专家的建议也是不够了，仅仅依靠个别负责工作人员的经验更不行了，而必须使我们调查研究也来一个“社会化”。就是说，让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部门以至各种基层单位都注意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整顿、健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这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机构，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和情报资料机构，成为“集体顾问（智囊）”，并互相配合沟通成“调查研究网”。在这方面，国外有不少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同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进一步社会化相适应，调查研究工作也必须社会化。只有在强有力的社会化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使研究机关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重大决策，并且逐步地走出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现代化的道路。

（首都理论界座谈会发言摘要，原载《光明日报》）

老干部在过去工作中所作的贡献，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仍要发挥他们的重大作用，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废止终身任职，只是要求广大干部，包括老干部在内，在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好地进行工作。当他们年老体弱、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或者由第一级退居二线工作，力所能及的工作，或者解除工作职务，让位给更适合的人。这有利于他们从繁忙紧张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考虑一些重大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加强对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指导。

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会不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废止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更有利于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的路线是什么什么人的路线，正确的路线应当是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的成果，而不应该是某个个人意志的反映。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就必须废止干部终身制。党的五中全会作出了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决定。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执行这个决定。当然，终身制的废止，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然而，我们相信，随着这个决定的贯彻实行，必将给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

（摘自辽宁《理论与实践》一九八〇年第五期，本报有删改）

剪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重印出版

《中外历史年表》重印出版



教师进行曲

——景山学校速写

黄宗英

是动乱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在北京，我碰到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祖国振兴的希望。他说：“我们想把景山学校毕业的学生的名字，知道是一座小学一贯制的进行教学改革。”

还有一次，我在访问某科学家时，他的小孙孙十一岁了，凑巧那天下午打雷，小孩子说起了大气电、正负电荷、电磁场……我说：“真是家学渊源，都是您传授的吧。”

老科学家说：“我才顾不上灌他哩。是学校里开了常识课，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不懂的事。景山学校没有家庭教育，我找一帮！”景山学校为低年级开设的常识课，每周两节。这门课，不留作业不考试，通过画画、实物、简图、有兴趣的故事，由浅渐深，使科学的细胞注入小学生的思维活动。让下一代从小就长出科学的翅膀。每个星期，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门有意思的课。

还有一次，我陪一位外国专家游园。家常的事情一个样，我们请一位翩翩的姑娘按下一照相机。姑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过后我问：“你是哪个大学的？”她答：“我在农村插队八年了。正备考。”“英语是突击的吗？”“不，是在小学学的。”

“小学？”外国专家问。“我们从一年级起开始学外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外国专家睁大了眼睛：“什么学校？”

“景山学校。”

“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中国有这么个学校？语言就是应该从小开始学。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掌握外国语言，对孩子并不是难事。他的发音没说的！你该早告诉我，这关系到中国‘四化’……”她很动感情地跟我说：“黄，我真的想放暑假日（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每年有假期）到这所学校去教孩子。你曾问我问，他们欢迎不欢迎？”

是“冬老人”还在和“春妮儿”较劲要滑的季节，清晨大早，我和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一起来到景山脚下的景山学校——首都，一条平常的胡同，一个平常的操场，一幢平常的楼房，一间平常的教室。

春风，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吹得小雨轻轻地地下……

小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耍，小手放在身后，专注地望着黑板，哈着热气的小嘴在朗读。啊，这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我忽然觉得这间课室极不平常了。象我在电视里看见过的进口成套外语教学的讲授课室似的，同样闪烁着科学的异彩。这里是，创造出了使我神往的不平常的数字。

关于一、二年级小学生的平均识字数：

- (1) 解放前：989字；
(2) 1950—1959年：1200字

(3) 景山学校从1960年起试验集中识字学了：2200—2500字

两千二百字——两千五百字！啊，据统计，一般书报杂志，生活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数字。那就是说，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如果他有兴趣，他可以翻开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书稿上一瞧了。那就是说，象《天方夜谭》里勤劳的小儿，他已经得到了“芝麻棒”的秘诀。科学文化知识，将为他开启山门，呈献宝藏了。

老师们是怎样一笔一划一撇一捺，把汉字分解、归类，怎样探索形声字、会意字、转注字、假借字之间的奥妙；怎

样总结集中识字、大量阅读、抓繁作文和形象、记忆、判断、想象之间的关系……原说，我闹不清了，我虽然是个识字分子，却全然不懂识字的规律，要承认，这是一门了不得的学科！如果两年能掌握2200—2500字，谁能说汉字比欧美语言难学呢？（变格、时态……也得按合好几年哩！）

不但对小学教育、对成人扫盲是福音；对国际交往也是好消息。识字，是个现代化的“桥梁工程”。没桥，再宏伟的规划和任务，都只能隔江长叹。

我忘了自己认字快、读“大狗跳、小狗叫”，费去多少时光。但是，我痛心地、明白地知道，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里的青少年文盲、半文盲回开了；城市里，中、小学的文化程度下降了。一场噩梦醒来，堪喜的是：“四化”在血火中争得了生的权利，理想的大厦毕竟立起来了。堪忧的是人才“森林”过伐甚然；而小树的速生长，更是自然。

所以，2200—2500字呀，如聆仙乐，令我惊喜陶醉。虽然，这乐曲，景山学校的老师，付出了自己心血、汗水和青春，更该记起，是他们的辛勤和困难，让我听到了这乐曲的动人。

们已经唱了二十年，从发乌黑唱到了发苍苍，唱了五分之一个世纪！

二十年，寒来暑往，七千多个朝夕，老师们带领着一班又一班小学生，呼唤春风。

二十年，有的老师，是自愿从大学的讲台上走下来，来到跳橡皮筋、踢小足球的娃娃面前。二十年，有的老师，推着两条长长的发髻，闪着温柔柔亮的眸子，还来不及把爱情的弦儿奏响，为了教育，她已以整个身心举起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火炬。

记得，我小时候听过舍身喂虎的传奇；大起来读过凤凰涅槃的诗句。只是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明明白白的好事，在我的祖国，却要几度死去活来去取得存在的权利！

学校，校牌好端端地被摘下；课室，在动乱中被砸碎了；校门，承受了多少耻辱和恶言；楼房，在地震中，歪斜了烟囱；连窗台、天花板至今还在心碎地呻吟。可是景山学校的老师啊，一直积极劳动，一直乐观勇敢。生活的辛劳和困难，让我听到了这乐曲的动人。

润物细无声

王寿兰

一场春雨落地，教研组里一位上年纪的老师吟诵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家听后议论说：当前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多么需要春风春雨，润物细无声啊！

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迫切需要人才，对两亿多青少年学生的培养，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成败。有的同志讲，胎息一代人比损失几千万吨钢还厉害。教师、家长和社会上的成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青少年一代培养成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教师和其他教育者（包括学生家长）作为“园丁”和“人类灵魂工程师”，需要切实充分认识肩负的责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用真挚深厚的感情，使“爱”的雨露渗入青少年学生的心灵，直接激发起内在的积极因素，产生积极向上的力量。

都有一个“十年树人”的目标，共同做工作。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潜移默化，就象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润物细无声”，使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虽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负有神圣使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园丁”，只要用心血培植人才，今日做到“润物细无声”，他年定会桃李满天下，铺满登程四化中。

春催桃李

沈崇道



访日杂忆

王仲奇

难，且丢在一边。那怕月底没钱去买豆腐乳、萝卜干，那怕自己的孩子生病在急诊，老师还是微笑着把丰盛的精神食粮捧到学生面前。春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比遗传工程还顽强。这里，最年轻的老师，年纪只有二十三，却担负着十年级的语言课程，教毕业班。

我坐在这间不平静的课堂里。我看到冰在溶，雪在化。我听到社会主义的一声呐喊。啊，我的姊妹们，你们使“老师”这庄严的称谓，更增添了光彩、加深了意义。你们日夜抛洒知识的大海，为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结出生命甘露的盐的颗粒。你们日夜开凿文化的矿藏，给一群又一群的少年，供应充足的前进的动

力和趣味。崇高与卑鄙，让真理和美，活在课堂上的声声曼语里。……

一部古诗的回国

吴德铎

去年五月十六日，我在本发表过一篇《一部日本珍藏的中国古书》。内容是介绍珍藏于日本宫内厅书库部（即原日本皇国图书寮）的《全芳备祖》的宋刻本。我们所期待的这个珍品，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我们这对一刻本，所知本极有限，以为它既是我族，数量不会很多，思想上便以吉光片羽、断简残篇的眼光来看待它。寄到之后，才知道这一残卷有四百五十余叶（双页）之多，每页影印时一幅幅地摄影，共要拍四百多幅，且不说其他，单单影印，日本朋友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便值得感谢不已！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识版本，一般均依据卷首的题识、牌记、图章等标志，现在虽因原书残缺，缺少了这部资料，但从行款、字体等来看，原书的确实是宋刻本。每卷卷前的“建安校订”的字样，更证实当年日本学者对这部书作的判断（断定它是你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便到达北京。

《全芳备祖》原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三十一卷，两集共五十八卷。刻本现存前集四十四卷，后集二十八卷（中一卷残，下同），两集共四十二卷，如按卷数计算，现存篇

书林一叶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

王仲奇